

◀ (上接12版)

刘鹗的父亲刘成忠多年为官于河南，有“循吏”之评价。1877年，刘成忠退休被赏加“布政使”衔定居于淮安，家门楣悬“太史第”匾。刘鹗的身份是刘道台家的二少爷。不虑衣食的刘鹗，对新的科学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不愿学习八股，对科举考试也从未显示出当时文人的那种兴趣，埋首于治河、天算、乐律、词章、医学、兵法“杂学”。说他桀骜不驯，是因为他狂放不羁、不守礼法。他待人亲善、无等第观念，常以官宦人家子弟的身份，侧身于贩夫走卒之间，甚至敢于光臂赤膊，高擎龙头，欢舞在龙灯队伍的最前列，淮安人称他“刘二乱子”——乱了世俗的规矩，乱了封建的礼法。刘鹗曾在黄河边“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之事，悉任之”，也敢于对当朝重臣李鸿章当面说“我是小汉奸，你就是大汉奸”。任意所为，敢说敢干，不守绳墨，是刘鹗与常人不同之处。

刘鹗的桀骜不驯可从刘鹗对待婚姻的态度为例。1873年刘鹗娶妻王氏，又娶妾衡氏。因王氏病故，刘鹗不肯立衡氏为正。于是衡氏家族告刘鹗骗婚，而衡氏败诉。1886年刘鹗在镇江，醉中请人为其娶茅氏女。茅氏家人欣然应允，而刘鹗已忘其事。亲口所言，无从反悔。及婚，茅家知非正室，向媒人责问。经调处，则以嫡礼相待，后夫妇感情甚好(王国维在1916年日记中多次提到去探望的“刘太夫人”，就是这位茅氏夫人)。后刘鹗再娶一位王氏为第三妾。1897年《时务报》刊出梁启超《记江西康女士》赞扬留学美国的康爱德女士，惜其未婚。无妻而有三妾的刘鹗5月上旬写信给梁启超，信中请梁作“冰人”，欲取康爱德博士为妻。并说明自己：

……已有姬妾，子女年亦强仕，本不愿续，为思中国习气锢闭已深，此奇女子有难以择配者，仕官之家必多顾忌，则其才难于展布，不禁有毛遂自荐之意。亦所以成就卓如(梁启超)先生开中国女学之心也，未知高明以为如何？康女士终身未嫁，自然原因种种；刘鹗求婚未果，也是想当然的事。清末一妻多妾并不奇怪，醉中求婚醒后而不自知，却又促成一段“良缘”已是奇事。但刘鹗以求婚是为“成就卓如先生开中国女学”的论点，确实是一种奇想。用现代的语言说，刘鹗就是一个思维与常人不同，敢于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刘鹗的“不守绳墨，桀骜不驯”其实是对封建桎梏的一种对抗。

志向明了，才气甚大的刘鹗

他的志向与才气在其十七八岁时已经显现。刘鹗的第四子刘大绅云：“先祖由御史出官河南，历任繁剧，军书簿书，日不暇给。先君随侍任所，蒿目时艰，隐然有天下已任意，故所在辄交一时才俊，各治一家言。先君当时交游中，如柴某专治财赋，贾某专治推步，王某专治拳勇，均造诣深邃。”

刘鹗写《老残游记》以老残自喻。第七回老残向申东造推荐侠客刘仁甫：“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看天下将来一定有大乱，所以极力留心将才，谈兵的朋友颇多。此人(刘仁甫)当在河南时，我们是莫逆之交。相约若国家有用我辈的日子，凡我同人要相助为理的。其时讲舆地、讲阵法、讲耕织、讲武功的各色朋友都有，此公就是讲武功的巨擘。”研究者说，此刘仁甫，系指当时名动大江南北的侠客大刀王五。

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幕僚，时任湖北自强学堂总督察的姚锡光1896年的日记多处谈到刘云转——刘鹗。姚在6月27日日

记中写道：“云转现以承办铁路事来鄂见香帅。盖中国将创办铁路，去年赴军务处禀请承办者四人，一刘、一许、一方、一吕。刘即云转也。云转才气甚大，前以同知曾办山东河工，见知于张勤果公。经勤果保奏，送部引见，后积劳荐保知府。自前年秋冬之交即经营中国开铁路事，往来津、京、上海间，外商洋人，内谒当道，南北奔驰，再历寒暑。”湖北自强学堂，是现在武汉大学的前身，总督察就等于校长。姚是刘鹗兄长刘味清的至友，对刘鹗多有了解。广阅人才的姚校长如此肯定刘鹗，当是出于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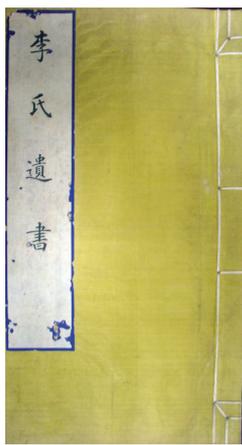
以上三例可以说明刘鹗的志向与才气不同于一般。不守绳墨的做法，桀骜不驯的性格，明确的志向，超人的才气在刘鹗的身上得到了统一。

刘鹗在太谷学派中的地位

刘鹗是太谷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刘鹗在太谷学派弟子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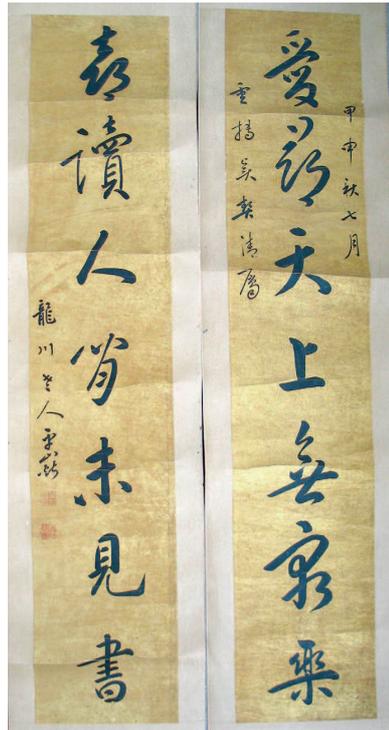
刘鹗自幼以来对耳闻目睹的悲惨国运与广大人民颠沛流离的痛苦之悬问久而未决。拜从李光炘是他希望从哲学的真理中寻找解脱，解决对“人生”的认识，以确定生活的方向，也就是致力于寻求所谓“安身立命”之处。就太谷学派而言，它需要有能够承担“教养两途”的接班人。此“养”有两解，一“养”是承担太谷学派当时本身的活动经费，另一“养”就是“养天下”。

太谷学派收弟子有严格的程序。第一要有一个太谷学派弟子(太谷学派中自称“圣功弟子”)引荐，第二要经过一个时期的考察，第三要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至目前还没有证据说明刘鹗初次拜见李光炘的引荐之人是谁。李光炘考察刘鹗四年后才决定收刘鹗为弟子。这说明李光炘对是否收刘鹗为



▲浙江省图书馆保存的李光炘著作《李氏遗书》(刘德隆摄)

▶应刘鹗之请，1884年李光炘书赠刘鹗对联(刘德隆摄)



弟子慎之又慎。太谷学派拜师仪式中的道统传人“师”——太谷学派中人称之为“山长”，要给弟子一条四字“真言”。“真言”共四种，分别为“同人桃源”“福慧双修”“希贤希圣”“超凡入圣”。一般的弟子可能得到前两种。能够得到“希贤希圣”很少，能够得到“超凡入圣”者凤毛麟角。而李光炘给予刘鹗的正是“超凡入圣”。这四个字即是对刘鹗此前作为的肯定，又表示李光炘对刘鹗今后寄予的厚望：李光炘终于找到了一个与自己性格相似、意气相投的弟子。

刘鹗自愿成为太谷学派人入室弟子后，主动承担了太谷学派“教养两途”中“养”的重担。1902年太谷学派南北合宗，设“归群草堂”于苏州葑门十全街。其时门徒甚众，直接居住于“归群草堂”内的门徒约200人，这些门徒的生活经济问题基本由刘鹗和时任江南制造局总办的毛庆蕃等人负责。

相传，“光炘临歿，遗嘱有‘二已传道’之语。二已，指葆年与鹗也。葆年生于清道宣宗道光二十五年，其年为乙巳；鹗生于文宗咸丰七年，其年为丁巳。鹗学务博，不以一端名；葆年守约，独能嗣其统。葆年字隰朋，一字希平，号归群，光绪己卯举人，宰泗水十载。其后，卜居吴下，从游塞门。”将刘鹗与黄葆年并列，可见刘鹗在太谷学派中的地位之高。

刘鹗对太谷学派、对李光炘的景仰从刘鹗写给同辈“山长”黄葆年的信中可见一般：

(我刘鹗)谤满天下不觉稍损，誉言满天下不觉稍益，惟一事不合龙川之法与公(黄葆年)所为，辄怏怏终夜不寐，改之而后安于心，此又不足为外人道者也。弟之于公，其所以同者志也，所不同者学与养也。公能知天，公能信

天，此公学养之至也。弟固未尝知天，弟固未尝不信天。惟其不能知天，故竟以天下为已任。天下之安危，匹夫与有贵焉。

刘鹗以“养天下”为己任

刘鹗年轻时“隐然有天下已任意”，那么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呢？他的“己任”是什么呢？他要为“天下”干什么呢？

刘鹗曾在扬州行医，但门可罗雀；刘鹗曾开设烟草馆，这是为糊口。刘鹗曾自荐治理黄河，让流离失所的灾民能够安定生活；刘鹗曾自筹巨款亲人被联军强占的北京，开展施粮施医的赈灾工作。刘鹗的所作所为都是由自发至自觉的行为，没有任何外界的逼迫。这是为什么呢？刘鹗如此说：

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黄葆年)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为之。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同为空同之子孙，同培古今之道脉，同身同命，海枯石烂，无有贰心。这段文字是1902年(李光炘去世后的第十七年)11月刘鹗给黄葆年信中所说。这里刘鹗明白地向世人宣布：我的“天下己任”就是“以养天下为己任”。

什么是“养天下”？这是中国古代就不断讨论的问题。

《书·大禹谟》指出“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战国策·齐策·赵威后问齐使》：“齐有处士钟离子无恙耶？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也。”

这是说“善政”就必须“养民”。通俗地说，“养民”就是“养育人民”，就是给人民以饭吃，



▲《太谷学派遗书》三辑十七册(刘瑀摄)

▶1900年为进京赈济，刘鹗写给救济善会负责人陆树藩的信(刘瑀摄)

